

# 魯迅新傳(二)

(本文插圖刊第四頁)

●周谷

## 暗通款曲掩護共黨

### 搭上女生陷入左聯

魯迅正受到中共上海地下黨一部份黨員的圍剿無力招架的時候，中共江蘇省委突然介入，才終止了這場論爭，停止了對魯迅的圍剿，使魯迅得以突出重圍。

一九二九年秋天，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李富春在上海霞飛路約陽翰笙談話，李對這場論爭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點「你們的論爭是不對頭的，不好的。你們中有些人對魯迅的估計，對他的活動的積極意義估計不足。魯迅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中過來的一位老戰士，堅強的戰士，是一位老前輩，一位先進的思想家。他對我們黨員個人可能有批評，但沒有反對黨。對於這樣一位老戰士、先進的思想家，站在黨的立場上，我們應該團結他，爭取他。你們創造社、太陽社的同志花那麼大的精力來批評魯迅，是不正確的。」註①。第二點「我約你來談話，是要你們立即停止這場論爭，如再繼續下去，很不好。一定

立即停止論爭，與魯迅團結起來。」第三點「請你們想一想，像魯迅這樣一位老戰士、一位先進的思想家，要是站到黨的立場方面來，站在左翼文化戰線上來，該有多麼巨大的影響和作用。你們要趕緊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你們也會解決的，然後向我來匯報。」註②

陽翰笙當即表示完全接受李富春的意見和批評。就在談話後的兩天，陽見到了潘漢年，潘說他已接到這樣的通知。於是他們便召開了一次黨員幹部會議，參加的有夏衍、馮雪峯、柔石，創造社有馮乃超（馮子韜）、李初梨、李一氓、彭康，太陽社有錢杏邨、洪靈菲、孟超等人。會上決定：「創造社、太陽社所有刊物一律停止對魯迅的批評，即使魯迅還批評我們，也不要反駁，對魯迅要尊重。」同時還決定派馮雪峯、夏衍、馮乃超三人「和魯迅去談一次話，告訴魯迅黨讓停止這次論爭，並批評了我們不正確的作法。」註③。魯迅親自接見了中共派來向他瞞頭的三代表，魯迅笑容滿面很高興，表示願意與中共的黨員們團結起來。

中共上海地下黨終止了創造社、太陽社和魯

迅之間的論爭後，這兩個團體的中共黨員一致要求大家組織起來以便統一行動。這個新組織不僅要把搞美術的、戲劇的也要一同聯合組織起來。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中共黨員小組都屬於中共上海地下黨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此一區域原屬日本租界區。郭沫若當時就住在此區，他常穿日本和服出來應酬，人們都以為他是東洋人。創造社中共小組人數較少只有潘漢年、李一氓、陽翰笙等三人。太陽社中共黨員人數較多，有兩個中共小組，計有蔣光慈、錢杏邨、戴平萬、洪靈菲、孟超、楊邨人、樓建南（適夷）、森堡（任鈞）、劉

一夢、馮憲章、殷夫等人，潘漢年最初是中共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書記。潘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曾參加北伐。一九二八年調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文化出版和文藝界的聯絡工作。第三街道支部多文化工作人員，因之後來改稱為中共上海文化支部，由中共江蘇省委領導。

中共上海文化支部就領導了這個要聯合組織起來的工作，多次在黨內會議醞釀、討論。並且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李立三，幹事潘漢年）在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即已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由潘漢年主持，這時便由潘漢年來負責這個聯合組織的任務。一九二九年十月中旬在上海北四川路咖啡店樓上召集了創造社、太陽社、夏衍、馮乃超及黨外的鄭伯奇開會，商討實際行動。潘漢年代表中共中央宣傳部參加，會議由潘主持。會議決定成立十二人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籌備小組：魯迅、潘漢年、錢杏邨、夏衍、馮乃超、馮雪峯、柔石、洪靈菲、李初梨、蔣光慈、鄭伯奇、陽翰笙。註④

籌備左聯的中共黨小組奉中共中央命令儘快擬出兩個文件：甲、擬定左聯發起人名單；乙、起草左聯綱領，由馮乃超擬辦。並且要把這兩個文件的初稿先送魯迅審閱，得到他的同意後，再由潘漢年轉送中共中央審查。發起人包括創造社、太陽社、我們社、引擎社、南國社、語絲社（魯迅系統）、文學研究會、上海藝術劇社等文化社團的成員。馮雪峯、馮乃超、夏衍、潘漢年曾和魯迅談過籌備情況。一九三〇年元月上述兩個文件定稿後，曾徵求魯迅的意見。左聯的綱領係參考日本「納普」（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綱領和組織系統而草擬的。同時，中共和魯迅講明，魯迅是他們和左聯的領導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先得到他的同意才辦。註⑤

中共黨組織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假上海北四川路九九八號咖啡店二樓召集籌備人員會議，當時對外稱作「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在咖啡店開會比較安全，中國人不大去，外國人對喝咖啡的人又不注意，魯迅出席了籌備

會，並在會上講了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終於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下午二時，假上海寶樂安路二三三號中共領導的中華藝術大學（創校於上海閘北江灣路花園街，一九三〇年遷至北四川路底寶樂安路二三三號）內召開。潘漢年代表中共先講話，魯迅也在大會上講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參加成立大會的人如下：註⑥

馮乃超、華漢（陽翰笙）、龔冰虛、孟超、堯爾（俞懷）、丘韻鐸、沈端先（夏衍）、潘漢年、周全平、洪靈菲、戴平萬、錢杏邨、魯迅、畫室（馮雪峯）、黃素、鄭伯奇、田漢、蔣光慈、郁達夫、陶晶孫、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殷夫）、朱鏡我（谷蔭）、柔石、林伯修（杜國庠）、王一榴、沈葉沉、馮憲章、許幸之。

大會通過了綱領，採取集體領導方式，選舉了聯盟十三個執行委員。左聯設中共黨團書記，其執行委員會下設常委、常委書記和秘書處，另外成立組織部、宣傳部、編輯部及各種委員會：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委員會（理論研究會）、國際聯絡委員會（聯委會）、大眾文藝委員會（衆委）、創作批評委員會（創委）、詩歌研究委員會（詩歌組）、小說研究委員會（小說組）、漫畫研究委員會、工農兵文化委員會等組織。當時參加左聯的人事後回憶對各委員會的名稱亦不盡相同。左聯並在各地設分盟、支部、小組等單位。上海設有總盟外，另在北平成立左聯，東京有分盟，還有天津支部、保定小組、廣州小組、南京小組等機構。總盟有一五五人，北平左聯八十五人，東京分盟二十九人，其餘支部小組人

數很少。盟員亦常有流動，參加總盟後又再加入其分支單位的也有很多。左聯發起人之一田漢因為不參加或少參加左聯發動的亡命「飛行集會」，曾受過不止一次的警告。另一發起人蔣光慈因為一九二九年出版小說「麗莎的哀怨」為中共中央所不滿，一九三〇年十月被開除黨籍，盟籍當然也隨之喪失了。魯迅的老友左聯創始人之一郁達夫，從未參加過左聯的任何會議，他自認「自己是一介文人，不是一個戰士」。而左聯內部人事又十分複雜，郁達夫乃先逕函左聯「要求脫離關係」。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左聯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其中第六項決議「肅清一切投機分子和反動分子——並當場表決開除郁達夫」。他已被左聯視為投機分子和反動分子了。抗戰初期郁達夫遠去新加坡工作化名趙康，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註⑦

當時左聯的人員其中有很多人是在其後中共的歷次運動中被打成中共的叛徒、反革命了。如馮雪峯、田漢、周揚、周立波、胡風、丁玲、孟超、王任叔、杜國庠、潘漢年、蕭三、穆木天（穆敬熙）和他的太太彭慧（彭連清）便是。一九三七年七月鄧小平復職後，中共中央開始平反一切重大的假案、錯案、冤案，馮雪峯他們的名譽逐漸被恢復了，讓寫文章的人敢於把他們的全名暴露出來，否則禁忌太多動輒得咎。現在還有一部分老盟員如周揚、馮乃超、陳荒煤、張天翼、梅益、吳奚如及北平左聯的曹靖華、劉曼生（現名谷牧）、荀晴川（現名秦川，筆名綠哥），天津支部的張香山等仍然相當活躍。

左聯雖已成立，但因不能公開活動，所以在上海浙江路附近先施公司後面的牛莊路以商人「高字間」名義，租過浙寧大樓一間相當大的房子為左聯的機關。左聯又曾在上海靜安寺路四八七號「王盛記木器店」樓上，租屋作為左聯秘密活動場所。這地方後來成為中共中央文委的辦事機關註⑤，潘漢年於籌組左聯工作完成後，一九三〇年底即離現職，改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直至一九三三年離開上海前往江西蘇區，才不再過問左聯的事。魯迅成為左翼文藝統帥之後，左聯直接發行的刊物與左聯有關的刊物，統由魯迅支配，這是他用武之地。按出版先後計有：萌芽月刊（後改名新地月刊）、拓荒者（月刊）、巴爾底山周刊、五一特刊、世界文化（月刊）、前哨（後易名文學導報）、北斗（月刊）（左聯機關報）、十字街頭（半月刊）、文學（半月刊）、文學月報、文學新地等期刊。北平左聯也創辦了文學雜誌、文學青年、文藝月報，東京分盟也出版了東流、雜文、質文、新詩歌等。

左聯的機關刊物，由左聯秘密盟員曾就讀黃埔軍校一期，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的宣俠父（宣俠父藏名札嘉才仁、札喜山崔倫）資助左聯創辦「湖風書局」出版。書局還另出版中共黨員的著作及其他翻譯作品，一九三三年被封閉。宣俠父本人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被殺於西安。註⑥

左聯成立後，曾對外展開活動，與蘇聯、日本、美國、法國、德國、英國、匈牙利等國的作家常有聯繫。與「國際革命作家同盟」關係更為密切。三十年代初期一些在蘇聯莫斯科避難的匈

牙利、波蘭、德國、義大利、羅馬尼亞等國的作家常有集會，並擬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五日在烏克蘭首府哈爾科夫召開第二次「國際革命作家同盟代表大會」，邀請已在蘇聯的蕭三與會，並囑蕭三寫信邀請中國作家前往參加。左聯告訴蕭三說，派人與會十分困難，請他就近代表左聯出席大會。會後成立「國際革命作家同盟」書記處，並出版幾種文字的「國際文學」雜誌，並接納左聯與「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同成為國際作家同盟的一個支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魯迅去北京，想去蘇聯參加國際作家同盟大會，但未能成行。左聯並派蕭三為常駐作家同盟代表，左聯並按期向作家同盟報告工作，介紹中國文壇狀況。註⑦

魯迅在左盟左聯期間，中共中央於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上海香港路銀行公會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對外用歐美同學聚餐會名義。傳說魯迅、田漢、洪深、馮雪峰都參加了大會，魯迅並在大會上發表了祝詞註⑧。蘇區代表大會主席團於同年七月邀請左聯、革命互濟會、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共中央等四十五個單位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中央準備委員會，參加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在江西瑞金葉坪召開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等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左聯存在期間曾對外發出了一些呼籲政治解放的信件。在美國出版的一種共黨機關報「新羣衆」(New Masses)於其一九三一年元月第六卷第八期上，曾發表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致「同志們」的信。並特別在此文的左邊，印製了魯迅五十歲生日的一張全身在藤椅上的坐像。此文主要說：「我們需要革命的世界無產階級的支持」，並「要求慷慨地支持中國的農民和工人為一個新共產主義社會的奮鬥。」又說左聯的目的在「消滅帝國主義，支持世界革命，保衛中國的革命，建立共產主義的文化。」這一期還刊載了史沫特萊 (von Agnes Smedley)，自上海介紹中共紅五軍活動的文章。一九三一年六月第七卷第一期的「新羣衆」又發表左聯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致「全世界革命文化團體、全世界著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科學家、全世界為人類進步的思想家」的一封信，全信在說明中共當時所指在中國境內的白色恐怖，在此信的刊頭上還複印了左聯被殺的胡也頻、宗暉、柔石、馮鏗、殷夫、李偉森六位作家的遺像。這封信先由魯迅和史沫特萊共同起草，再由茅盾修飾信中的少許文句後，譯成英文發表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在美國出版的「今日中國」(China Today)第三卷第六期，還刊載了左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致美國作家代表大會的信」。為左聯對外聯絡工作的就是那位史沫特萊女士。左聯對外發出的公開信件，只能說已在出版自由的地方公開出版了，但究竟有多少人看到這些信，多少人又受其影響呢？不無疑問。

魯迅自始支持左聯。左聯的名稱也是潘漢年囑馮雪峰先去徵求魯迅的意見。這個組織的名稱適宜與否，取決於魯迅。魯迅同意用左聯，認為這樣旗幟鮮明，所以三十年代才有「中國左翼作

家聯盟」一詞的出現。上海中共地下黨後來把左翼當作直接從事政治鬭爭的一個半政黨的團體，成爲第三個政黨。差不多完全放棄了去爭取公開的、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存在，因此被迫不得不向地下發展生存，由半秘密而完全秘密，最後只剩下少數的中共黨員在支持左聯，甚至魯迅有時也要被迫遷居或避居。左聯多靠魯迅的地位和名譽來推動它的工作。魯迅晚年幾乎以左聯爲發揮他文學思想的重鎮，左聯也是他戰鬥的陣營，當時搞左聯工作的人又多爲愛好文學的年青人，魯迅遂成爲他們文學思想的指導人和領導人。魯迅主要是經過左聯而保持與中共之間的經常聯繫。

⑫。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排擠出中共中央之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自動領導文藝工作，使左聯的活動帶來很大的變化，瞿秋白又支持魯迅的一切活動，兩人感情密切常有往來，互有唱和，更增加左聯在文學活動上的聲勢。

左聯成立後不久相繼成立了社會科學家同盟、社會科學研究會、新聞記者聯盟、世界語者聯盟、電影演員聯盟、話劇演員及美術家聯盟。中共中央又把這些「聯」字號社團統一組成一個「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以後成立的音聯也加入文總。文總第一任負責人李一氓。文總設有中共黨團、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的成員，同時又是文總的黨團成員，文委的書記又是文總的黨團書記。文委成員先後有杜國庠、彭康、馮雪峰、王學文、夏衍、田漢、錢邨杏、錢亦石等人。

左聯活動期間大部份時間都在中共左傾路線

統治時期。當時的口號不是「無產階級文學」便是「普羅文學」，組織也是什麼「普羅詩社」、「無產階級文藝俱樂部」。每逢節日在上海街頭上寫標語、散傳單，搞遊行集會，示威遊行高呼「武裝保衛蘇聯」。左聯盟員雖經常參加宣傳工作，半夜在馬路牆壁上用棉花或爛布蘸黑汁刷上「擁護蘇維埃」等的大標語。有時在上海三大大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公共廁所內關起廁所門寫標語，或在馬路上散發傳單或在餐廳頂樓上散發傳單。每次遊行人馬都受相當大的損失，魯迅看不過這一羣年幼無知的人，他們的思想太左了有勇無謀。左聯把老頭子捧出來，又不聽老頭子的話，魯迅只好喟然嘆息。

左聯自一九三四年以後幾乎已經沒有公開的活動。第三國際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大會，第三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於八月二日大會上，報告「法西斯主義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爲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鬭爭的任務」，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王明同日也在大會上闡述了組織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蘇聯也準備另照統一戰線的新的精神，組織更廣泛的統一作家協會即「蘇維埃作家統一同盟」。中共在第三國際的全球戰略號召下，王明於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及中國共產黨中央」起草了「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隨即爲之共同署名發表。

中共中央這時正在軍行陝北途中，早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絡的上海文藝界中共黨的領導人，通

過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國時報」，詳細得知王明八月二日在第三國際所作「新形勢與新政策」（即「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亦即「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和共產黨的策略」的發言（此文刊於該報一九三六年元月九、十四、十九日及二月四、十二日）後，擬籌組新的作家統一同盟，以響應第三國際的號召。王明不過在文中反覆說明第三國際的新策略，也即是中共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即反帝統一戰線，籌組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抗日聯軍，以挽救中共即將可能面臨覆沒的命運。上海中共地下黨，又從史沫特萊處看到第三國際通訊上載季米特洛夫的報告。第三國際的統一戰線一出現，左聯中的中共黨員便躍躍欲試，決定要解散左聯另組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中國文藝家協會」。

左聯爲響應「八一宣言」擬提出新的口號，但無從請示，乃通過史沫特萊設法向左聯駐莫斯科國際革命作家同盟代表蕭三寫信，間接向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請示，經同意後乃提出抗日統一戰線的「國防文學」口號。此一口號首先是由周揚於一九三六年二月轉導出來的。一九三六年魯迅便介入自己陣營中「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無謂論爭。魯迅不同意「國防文學」這個口號，說它太含混、不明確，中共可以用，國民黨也可以用。他主張有另提一個新的口號的必要。胡風於五月六日在魯迅家見到剛自陝北回來的馮雪峰。次日又談到「國防文學」這個口號，馮認爲不妥，要胡風另提

一個口號試試看。胡風提議用「民族解放戰爭的人民文學」，馮主張改用「民族革命戰爭」及「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五月八日馮對胡風說，魯迅同意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並囑胡風寫文章把這個新口號反映出去。胡風當晚便完成使命，並先送魯迅核閱，魯迅一字未改同意發表註⑨。魯迅自己却說，他因病無法執筆便囑胡風把這個口號提出來。

胡風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由上海私立光華大學學生、左聯盟員馬子華等編輯出版的「文學叢報」月刊第三期上，發表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篇短文，曾把魯迅同意所提的口號公開出來，但在文中並不曾說這是魯迅親提的。胡風在這篇文章代魯迅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該說明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從現實的生活要求產生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方面也是繼承了五四的革命文學傳統，尤其是綜合了九一八以後的創作成果的。九一八以後，反帝運動底最高形態發展到了民族革命戰爭。在文學上那也得到了反映，到最近且已爭得了一些成功的紀錄，在這些作品裏面我們看到了民族英雄底比較真實的面貌，人民大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尤其是民族革命戰爭和人民大眾生活的血緣關係。這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先驅，是提出口號的作品的基础。」此文發表後，左聯負責人徐懋庸首先在上海「光明」半月刊為文反對。

徐懋庸原名徐茂榮，浙江上虞人。一九二七年四月清黨，徐在家鄉被通緝，一九二八年逃亡上海改名余致力考入上海國立勞動大學附屬中學，時年十七歲，兩年畢業後到浙江臨海回浦中學教書，一九三三年又到上海，次年加入左聯，在左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工作。一九三五年徐開始負責左聯事務工作，與魯迅關係甚為密切。一九三八年春徐到延安，同年八月始加入中共。兩個口號論爭一起，徐懋庸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寫信給魯迅表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徐在信中說胡風起初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對抗「國防文學」，「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並又嚴厲指責魯迅「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我覺得不做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自己陣營中的小校居然批評老頭子來了，刺痛了魯迅的內心。

魯迅於八月五日銜恨公開了徐的來函和他的覆信——「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作了針鋒相對的回答：

「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麼『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麼？）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現在文壇上彷彿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裏是並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抗日運動有利益。」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噉噉嚙嚙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但還沒有墮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糊塗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

郭沫若的「蒐苗的檢閱」一文於同年九月十日刊於「文學界」第四號，此文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新口號是不大妥當的，不正確的，這十一個字長的口號，根本就不大眾化，在「國防文學」口號之外，又提出這個口號是多事的。郭沫若要求魯迅把他自己的那一面紅旗「最好是撤回。」這是郭沫若的馬後炮。

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接見當時尚非中共黨員的徐懋庸，兩人談到這兩個口號的爭論時，毛說：「這次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的，這個爭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發生的。從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於革命陣營內部理論水平、政策水

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毛這麼一說，魯迅很自然被接收入毛的「革命陣營」，爭論也就煙消雲散了。毛又對徐懋庸說：「但是你們是有錯誤的，就是對魯迅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註⑭。這時毛把魯迅在中共的地位尊崇得更高了。

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王明說，這兩個口號都是他先提出來的。周揚等人在一九三六年初所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便是來自王明所擬的「八一宣言」所提組織國防政府一語。王明在他所著「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一書中，說魯迅等人一九三六年五月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是根據王明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為中共中央起草反對「九·一八」事件日本佔領瀋陽的宣言即「九一九宣言」，宣言中有「武裝人民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口號而來。但魯迅未必知道中共中央的「九一九宣言」這個文件，魯迅提出這個口號，未必從這個文件而來。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三月經毛澤東核准公開發表的，由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說，「國防文學」口號是「在王明右傾投降降主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的「資產階級口號」。而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稱為合乎「毛澤東思想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無產階級口號」。其實當年中共的政策都是緊跟第三國際的路線即斯大林的路線走，那時王明也好，毛澤東也好，都是第三國際在

中國的一個走卒。魯迅是局外人，不明究裏徒在文字上為後人憑添一段文壇話柄而已。

一九三五年第三國際第七次會議後不久，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王明於當年九月初要左聯常駐「國際革命作家同盟」代表蕭三寫信回國解散左聯。蕭三不同意未辦。同年十一月初王明厲聲責問蕭三：「你寫信回上海叫他們解散左聯沒有？」蕭三答：「沒有寫。」王明又再問蕭三：「你不贊成統一戰線嗎？……你不寫，我找別人寫。」這是命令，蕭三焉敢拒絕。蕭三立即去找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的康生長談。康生說左聯也的確太左了，搞關門主義，常常把中共中央的決議作為自己的宣言發表，康生又歷舉國內搞統一戰線的成功，說來娓娓動聽，蕭三為之動容，立即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八日以「S.3」(即蕭三)代號寫信給魯迅轉左聯。註⑮

蕭的來信甚長，大意說：(一)「我們以為左聯之關門，要從其唱『普羅文學』說起，因為這個口號一提出，馬上便把左聯的門關上了，因為這一口號，這一政策，便不能團結一班先進的，但仍未能一旦普羅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當初的時候普羅文學家對非普羅者的態度更只是個諷罵，大有『非我族類，羣起而誅之』之概。」(二)「因為左聯內部工作許多表現，也絕不似一個文學團體和作家的組織，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復古之聯合戰線方面來的組織，而是一個政黨，簡單說，就是共產黨！一般人認為左聯便是共產黨。加入左聯便要砍頭——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決定的呵。」(三)「因

此，我們的工作要有一個大的轉變。我們認為：在組織方面——取消左聯，發宣言解散它，另外發起，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極力奪取公開的可能，在『保護國家』，『挽救中華民族』，『繼續『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復古』等口號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聯合戰線上來，『凡是不願作亡國奴的作家，文學家，知識份子，聯合起來！』——這就是我們進行的方針。」(四)「這是一個主要的重大問題，也就是我這封信的中心問題，很希望同志們過細討論。」註⑯

周揚等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自魯迅手中接到蕭三的催命符後，立即召開中共地下黨文化工作委員會會議，研議如何解散左聯問題。錢亦石、鄧潔、章漢夫、胡喬木都在文委工作，他們與鄭振鐸、夏衍、茅盾等對解散一事意見不一致，乃派人去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不同意，認為為什麼一定要解散左聯去搞統一戰線呢，不如讓左聯秘密存在。如果一定要解散，也要發表宣言公開說明，否則就是潰散、投降，予敵人可乘的機會註⑰。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把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魯迅王國」解散了，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連「打一槍兩槍」的機會都沒有了，魯迅那能不痛心呢。

巴黎「救國時報」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表了陳昭禹(王明)所寫紀念魯迅的「中國人民的重大損失」一文，開頭就說：「十月二十日上午十點鐘，從真理報上，我們見到了『中國高爾基』——魯迅同志病死上海的消息。」王明

在文章中特別推崇「魯迅不僅是蘇聯舊有文學遺產和現有文學創作底忠實介紹人，而且是反對一切反動勢力對蘇聯造謠侮蔑底英勇的戰士。」把魯迅喬裝打扮成保衛「工人祖國」的戰鬥英雄了。還說：「當中國共產黨去年（按指一九三五年）發表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新政策時，魯迅始終表示熱烈擁護並積極地參加組織文化界反日民族戰線的事業。」王明所表彰的正與魯迅的行動相反，不是「始終表示熱烈擁護」，而且自始就反對解散左聯來另搞統一戰線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王明又說魯迅不僅痛恨「托陳取消派」，同時特別痛恨那些「沒有革命家風度」和「變節投降的人」，這是王明對魯迅的統一戰線，把魯迅拖向中共的苦海中。

周揚等「四條漢子」曾經把持左聯，藉口白色恐怖，既不開會，也不照以前對魯迅的承諾，「重要的事情，一定先要得到他的同意才辦。」凡事竟不向老頭子請示，魯迅領導左聯只不過是空名而已。解散左聯是中共上海臨時中央批准的，因為中共中央自一九三四年十月撤離江西蘇區後，他們與中共中央間的聯繫早就中斷了。由於魯迅不贊成解散左聯，左聯中的中共黨員也就不敢公開解散左聯，只好在一個刊物上說左聯已完成歷史任務，沒有存在的必要。從此解散。左聯解散的方式使魯迅頗不愉快。

### 外紅內白組三同盟

魯迅對周揚他們頗為不滿，左聯有時把魯迅當為客卿，很多事對他也很保密。左聯的關門把戲

，甚至也把它的主魯迅也關在門外。左聯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也對他保密，左聯一九三四年工作總結報告，事先也不同他商量，連一個招呼也不打就刊印出來了。因此，魯迅曾十分憤恨地說：「他們實際上把我也關在門外了。」魯迅畢竟是「外紅內白」呀！註⑩。馮雪峯一九三六年四月回到上海後，第二天見到魯迅，兩人促膝長談，魯迅說：「這兩年來我被他們擺布得可以。」這句話後來在馮雪峯的「回憶魯迅」一書出版時，改為「這兩年的情況慢慢告訴你吧。」註⑪。政治鬭爭的現象，正如黃河的水一樣總難澄清，它總會造成許許多多的偽善、虛假、冤案等等的光怪陸離的黨色。

為抗日統一戰線的號召，一羣作家又在中共黨國的指揮下，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假上海四馬路「大西洋西餐館」開會，到會一百餘人，成立了「中國文藝家協會」。魯迅拒絕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且與茅盾、曹靖華等六十三人聯名發表了由巴金、黎烈文草擬的其中沒有「國防文學」口號，也沒有「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是針對「中國文藝家協會」而發，算是結束了這一場內部的自我論爭。從此結束了魯迅在中共影響下的文壇上的指揮權。

在延安整風、審幹時期，批判王明路線的時候，蕭三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底在延安棗園親向毛澤東坦白，王明逼他寫信解散左聯的經過。毛澤東聽完蕭三的報告，才知道此事原委，對蕭三說：「啊！還是你寫信的呀！那就是和要解散共產

黨差不多……那就是和「中聯」、「右聯」一起搞瞎！」註⑫。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其中一項表示，「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又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均為毛澤東為中共起草的文件。毛澤東不但要擁護「八一宣言」還要「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進而自動取消暴動政策、赤化運動、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要請執政黨政府來領導。這比王明下令解散左聯還要棋高一着。毛成為中共又一個「取消派」，可媲美中共前賢「托陳取消派」嘛！魯迅晚年在上海參加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中國反帝大同盟」都是三十年代中共領導的黨外組織。馮雪峯、潘漢年奉中共中央命令希望魯迅做「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人，魯迅最初不同意。後來經過馮雪峯、潘漢年多次遊說鼓吹，勉強同意與郁達夫、田漢、潘念之、姚蓬子、潘漢年等其他五十人在上海共同發起組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同盟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三日在上海公共租界漢口路聖公會教堂秘密開會成立，還在南京、廣州、北平、天津、重慶成立了一些分會。二月十五日同盟發表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宣言，出版了機關刊物「自由運動」。一九三〇年六月十日同盟舉行執行委員擴大會議，出席三十三人，還選舉魯迅、姚蓬子、鄭伯奇、潘漢年等二十一人為執行委員。六月二十日又發出「自由運動大同盟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號召各地自動成立分盟，

並在「新地」月刊上發表，擬於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在上海舉行全國代表大會。聲勢雖然浩大，但大會未能如期召開，延至同年九月二十二日開會，到會代表六十餘人。周全平為大會總主席。註②。同盟的主要活動，除出版刊物作些文字宣傳外，還邀請魯迅等人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等校作些煽動性的公開演說，為此特別受到當局的通知。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曾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第一五八八九號公函，請國民政府取締左聯、自由大同盟等左翼組織：「頃奉常務委員交下中央宣傳部呈稱：『查上海地方還有「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左翼作家聯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羅詩社」、「無產階級文藝俱樂部」、「中國革命互濟會」、「革命學生會」等反動組織與已請取締之「自由運動大同盟」，同為共黨在羣衆中公開活動之機關，應一律予以取締，以遏亂萌。理合檢同該反動組織分子名單，呈請鈞會察核，轉請國民政府令淞滬警備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會同該市黨部宣傳部嚴密偵察各該反動組織之機關，予以查封，並緝拿其主持分子，歸案究辦，以懲反動而杜亂源，至為公信」等情一案。奉批「照辦，並將原附簡章等件送中央組織部。」除分函外，特抄同原附名單函達，即希查照轉陳為荷。此致國民政府文官處」。這時傳說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向黨中央發出「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的公文，主其事者為許紹棣。一九三一年元月十七日，「中國自由運動

大同盟」主席，中共黨團書記龍大道和左聯五位作家等一起在上海東方旅社被捕。自此而後自由大同盟便等於自行解散了。註③。

魯迅也參加過「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盟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由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楊杏佛）、黎照寰、林語堂五人發起，於十二月三十日在上海成立。由中共幕後領導，借用中山先生的民權口號以反對政府，宋慶齡、楊銓、蔡元培、林語堂、鄒韜奮、胡愈之、伊羅生（Harold Robert Leases）等七人組成同盟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魯迅的會員證號為第三號，會員號第二十號，宋慶齡的英文秘書史沫特萊也參加同盟工作註④。同盟除總會外，重要地方還特設分會。上海分會於一九三三年元月十七日在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三號國立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成立，到會的有蔡元培、楊銓、伊羅生、史沫特萊、魯迅等十六人，主席蔡元培。魯迅、伊羅生、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林語堂、鄒韜奮、陳彬龢、胡愈之等九人當選為分會執行委員，不久按規定中央執行委員不得兼任分會執行委員，伊羅生等辭去兼職。北平分會有會員四十一人，美僑三人。分會於一九三三年元月三十日成立，胡適、蔣夢麟、李季等九人為執行委員。胡適因不滿意同盟的一些行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決議開除了胡適的盟籍，北平分會也就這樣結束了。

同盟發表的抗議宣言在國內不能公開發表時，由史沫特萊、伊羅生等外國記者用新聞電發到國外。一九三三年元月中共中央自上海遷往江西

蘇區後，同盟的活動更為頻繁，先後營救過許德珩、陳獨秀、彭述之、廖承志、羅登賢及外國共產黨在華人員註⑤。宋慶齡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日在「追憶魯迅先生」文中，曾回憶說：「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時，魯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時到會。魯迅、蔡元培和我們熱烈討論如何反對白色恐怖，以便如何營救關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學生們，並為他們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這個同盟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一九三三年六月楊杏佛被暗殺後，同盟即停止活動。」

事實上，宋慶齡在上海是在第三國際指揮下工作註⑥。「世界反帝大同盟」由英國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馬萊爵士（Lord George Bernard Shaw）、蘇聯高爾基、法國伐揚、古久里（Paul Vaillant-Couturier）、羅曼·羅蘭，中國宋慶齡、魯迅等人組成，是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世界性組織。一九三三年六月第三國際對國際聯盟的「李頓調查團」（Lyton Commission of Inquiry）來華調查，也組織了一個「國際反戰調查團」由法國左翼作家巴比塞率領，故又稱「巴比塞調查團」。巴比塞後因病未前往上海開會。同年八月馬萊、法國作家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伐揚、古久里、比利時共黨馬托（Marleau）等人來上海召開遠東反戰會議。馬萊等於八月十九日到達上海。

中共中央派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馮雪峰秘密籌備召開，中共中央早於同年六月八日向全黨各級發出「中共關於歡迎國際反帝非戰大同盟代表團來華及反帝大會的籌備通知」，要求動員廣



大眾進行這項運動。魯迅於八月十六日簽署「中國著作家歡迎巴比塞代表團啓事」及左聯的「致上海反戰會議各國代表巴比塞同志等的歡迎詞」，八月十八日魯迅與田漢、茅盾等人聯合發表了「歡迎反戰大會國際代表的宣言」，隨即成立「中國反帝大同盟」註②。中共江蘇省委於一九二八年成立過「中華全國反帝同盟」成效不著。國際反帝反戰代表大會遠東會議（遠東泛太平洋反戰大會）於九月三十日在上海秘密召開，大會由宋慶齡主持，會議僅舉行一天，到各國代表及中共代表計六十五人。魯迅未出席大會。魯迅、毛澤東等人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名譽主席，大會還成立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上海分會」。這樣的秘密會議未收到什麼效果，只是完成第三國際的指令而已。在會議期間，魯迅於九月五日在上海蘇州河北邊北蘇州路六〇一號河濱大樓公寓三樓伊羅生家見到了伐揚·古久里及馬萊。「國際反戰調查團」派駐中國代表為美國人法國「觀察」雜誌記者綺達·譚麗德(Cida Treat)是斯諾夫婦的好朋友。她曾托斯諾特請魯迅在上海搜集左翼作家的繪畫，以便送往法國、蘇聯等處展覽。一九三四年元月十七日魯迅日記所說「以中國新作五十八幅寄譚女士。」即指此人註③。凡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活動，以及中共的交辦事項，魯迅大致都全力以赴。因之，魯迅已成為中共在上海的一位非正式代表了。

魯迅一九二七年到上海後，先後和好幾個中共在上海所領導的外圍組織建立了關係，第一個就是中國濟難會。他一到上海濟難會就派人同他

聯繫，還給濟難會捐過數目不小的款子。以後還應濟難會組織部長王弼（王望平）（對外身份為上海大同幼稚園負責人）之請為濟難會刊物組織。中國濟難會主要由中共在上海因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反對上海日商紗廠虐待中國工人而發起。發起人中包括其他黨派及社會人士計有楊銓、高語罕、譚代英、張聞天、郭沫若、沈雁冰、沈澤民、李碩燦、董亦湘、于右任、戴季陶、顧毓泉、吳開先等五十人，第一次籌備會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在上海西城小學召開，到會者三十餘人，同年十月正式成立，並在各大城市成立分會。照「中國濟難會發起宣言」所說，它的任務在針對慘案而言「以救濟為國家社會而犧牲的人們」，「和他們家屬的危難困苦」。

### 第三國際滲透誘惑

一九二九年九月後濟難會工作逐漸停止，代之而起的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成立的「中國革命互濟會」它是第三國際領導在巴黎的國際赤色濟難會總會在中國的分會，主要對象在救濟被捕之共黨黨員。中國分會專門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代中共招收軍官、軍醫前往江西蘇區，並辦訓練班，支援兄弟組織，出版刊物為中共宣傳。互濟會在中共直接領導下成立的，是中共的地下組織，成員全由中共黨員領導，和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是兄弟組織。互濟會須完成中共所交付的各項任務與濟難會任務迥然不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三年元月自上海遷往江西蘇區後，互濟會停止了蘇區以外的工作。互濟會在上海做了一件

大事營救「國際友人牛蘭夫婦」。註④

第三國際在俄共斯大林指揮之下，擬於一九二七年發動中共從中國國民黨手中奪取中國政治的領導權，從而在中國建立一個受第三國際指揮的紅色政權。不意國民黨先於當年四月十二日起先後在全國各地全面展開清黨，並用武力鎮壓中共所發動各種不同形式的暴動，致使第三國際意欲領導下的共產革命功敗垂成。同年八月一日中共奉第三國際命令被迫在江西南昌暴動，接着十二月十一日中共又在第三國際命令及蘇俄駐廣州領事館協助下在廣東廣州暴動成立「蘇維埃政府」。兩天後被消滅，餘眾潰散香港、潮汕等地。國民政府乃於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下令關閉各地蘇俄領事館，停止蘇俄在華商業機構營業，宣佈立即與蘇俄斷絕一切外交關係。

中蘇間的外交關係雖然斷絕了，但蘇俄並未因此放棄赤化中國的用心，乃另闢途徑從地上轉入地下。蘇俄鑒於日本積極謀略中國的野心，中共軍事力量逐漸在江西南部山區的膨脹，乃由第三國籍及蘇俄軍事當局分別秘密遠從世界各地，派不同國籍的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前來中國，搜集有關中國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有利於蘇俄的情報，並繼續支援中共的武裝和非武裝的地下活動。上海遂成為第三國際在遠東的重要基地及其指揮站。

一九三〇年元月第三國際派波蘭猶太人牛蘭(Hilare Noulens)亦名魯亦格(Paul Rugg)前來上海主持其遠東工作站，對外名義是泛太平洋職工會秘書處上海辦事處秘書。牛蘭持

用竊取而來的比利時護照化名范德克勞森(Ered Vanderkrusen)到上海。他在上海期間至少有十二個不同的化名，持有加拿大護照一本，比利時護照兩本，其妻也有五個化名和兩本比利時護照註②。牛蘭領導的上海站經常與中共保持密切聯繫。牛蘭不幸由於中國境外的共產黨案件牽連，於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國巡捕逮捕，同年八月三十日移送政府法辦，囚在上海漕河涇監獄。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在南京開庭審判，八月十九日判處死刑後減為無期徒刑。在此期間，「中國自由大同盟」特組成「國際援救牛蘭夫婦委員會」企圖營救，魯迅在其「南腔北調集。誰的矛盾」文內說：「有的又看不起他夫婦（按指牛蘭夫婦營救委員會英國人蕭伯納），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一同關在牢獄裏，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願提他了。」抗議牛蘭夫婦的無理逮捕和殘酷監押。一九三七年抗戰初期，牛蘭夫婦遭送蘇俄後，此案在中國便告結束了。

魯迅的國際朋友很多，有日本、英國、蘇俄、美國、德國、捷克、法國、奧地利等國人士二百四十六人，其中日本人最多有一七九人，蘇俄十三人，美國十二人，餘為其他國籍或未明國籍的友好。他的許多國際朋友有的止於通訊，有的則有私人往還，但多屬於文學上的交往。魯迅晚年至少有三位政治上最親密的美國戰友，其中史沫特萊與伊羅生是第三國際派到中國的工作人員，斯諾僅是一位美國新聞工作人員。魯迅與史沫特萊的關係非常密切，魯迅的一些著作與政治意

見，多經由這位紅色佳麗傳譯國外。

史沫特萊於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俄士古(Osgood)一貧苦農家，幼時與其母相依為命，有印第安人血統，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與布隆丁(Ernest W. Brindin)結婚，旋即離。史沫特萊曾化名愛麗斯·波德(Alice Bird)及白左衣可斯太太(Mrs. Petroikos)，一度在美國加州大學、紐約大學進修。在紐約大學讀書時，史沫特萊因受業師印度賴教授(Prof. Lala Lajpat Rai)的影響，曾參與印度人在美國領導的印度革命活動及參加美國共產黨活動，一度被捕。此女於一九一八年以輪船侍應生身份隨船到歐洲，突在波蘭但澤跳船轉往柏林活動。在柏林期間，由於印度友人的介紹，她獲識當地印度革命領袖威仁(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 史簡稱為Viren)。威仁曾與一愛爾蘭女天主教徒結婚，但婚姻早已破裂分居，前妻且早已入修道院為尼，但拒絕與威仁離婚。史沫特萊愛威仁甚深，遂與之結為夫婦共同生活。一九二八年雙方意見不合，又告拆伙分居。史在柏林以教授德人學習英文為生，一面又研究亞洲歷史欲往印度工作。因曾為威仁妻，英國拒予印度簽證，遂改道前往中國。一九二八年，她以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弗蘭福克新聞報」記者派往遠東工作。她先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到達上海註③。史沫特萊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函魯迅，兩天後(十二月二十七日)由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北京私立燕京大學哲學系時在上海

任教的董紹明(董秋斯)蔡咏裳夫婦陪同第一次拜訪魯迅，從此兩人相互訪問，成為政治上最親密的戰友。一九三〇年九月，她出面租用上海一家荷蘭人的開設「蘇臘巴亞」(Surabaya)印尼餐館，秘密為左聯慶祝魯迅五十生日活動。史沫特萊在中國不但參加中共的組織活動，還積極掩護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她還為上海中共外國組織「民族武裝自衛會」領導下的地下學聯展開活動。

一九三〇年元月十日德國共產黨左爾格(Richard Sorge)奉蘇俄紅軍情報部命令前來上海秘密建站，史沫特萊還為左爾格在上海羅致了德國人、美國人、俄國人、中國人來協助他在上海等地展開工作。左爾格的部分工作及通訊設備，就設在她的公寓中。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當權後，她失去了原有的記者身份，一九三六年秋她轉往西安工作，戰時她轉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在中共軍中活動，常穿中國當時灰布軍裝儼然隨軍記者。次年元月她曾任延安一段時日，由吳光偉(Liyi Wu)小姐擔任她的翻譯。她在延安期間經常與毛澤東、朱德會談，一度隨中共軍隊到山西工作，一九四〇年九月去香港治病，不久返回美國。史沫特萊在中國一段時日比較寂寞，她在中國的美國僑民中是孤立的，一般宴會也多不邀請她，因為她曾是印度革命者威仁的妻子，在美國僑民看來她仍屬於有色人種的親屬。

她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病逝英倫，遺願骸骨亡葬北京，次年五月六日她逝世一週年紀念日

，中共以烈士典禮葬其骨灰於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她的生前好友朱德親寫了墓碑——「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這位紅色佳麗、魯迅的好友，一生為第三國際、蘇軍情報部，為中共前後在中國工作長達二十年之久。中共得一國際紅粉知己頗不容易，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還為她特別舉行逝世三十五週年紀念儀式，並出版「史沫特萊文集」四卷，答謝她生前對中共的貢獻。

史沫特萊到上海後不久即與路易·艾黎（Rewi Alley）、馬海德（George Hatem）等人參加英國人巴林博士在上海組成的第一個外國人「馬列主義小組」活動，小組並與中共建立了黨組織關係。路易·艾黎也是魯迅的一位外國友人，路易·艾黎原名路易·曼尼亞波托，是紐西蘭的作家和詩人。他於一九二七年三月自香港乘澳輪折往上海擬作短期居留，後竟留連上海不歸。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隊任督察和檢查工廠安全的工業科督察長。他利用公務車多次為上海中共地下黨運送傳單、書籍，或協助轉移中共工作人員，以潘漢年為主的中共地下組織選在其住處屋頂上建立地下電臺，他還應請給中共洪湖地區賀龍部運送食物。他和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遠東支部書記美國人格蘭尼奇（Garnish）通過機關刊物「中國之聲」向國外介紹中共。魯迅與格蘭尼奇亦有往來，還為魯迅照過像。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史沫特萊邀請路易·艾黎陪她到魯迅家為她做翻譯，艾黎能說流利的上海話。一九三六年中共還請艾黎為他們套滙法幣，以後又

參加中共指定的工作。一九六八年文革期中，艾黎被鬪爭，由他一九三二年即已認識的宋慶齡親寫證明才解脫危局註②。

魯迅另一位美國友好斯諾（Edgar Parks Snow）。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出生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城一個出版商家庭，早年做過農人和印刷工人。斯諾於一九二八年畢業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最初在「堪薩斯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工作，一九二八年前往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編輯一年，同時先後並任「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一九三五年」倫敦每日前鋒報」（London Daily Herald）等報駐華記者。斯諾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開始與魯迅交往，兩人不是聚談便是餐會，並時有信函往來。魯迅稱他為施諾或S君，斯諾還為他寫了「魯迅評傳」發表，很推崇他的作品。斯諾在上海認識在英文報刊撰稿的姚克，姚克原名姚志伊號莘農，畢業於江蘇蘇州私立東吳大學。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姚克應斯諾之請，函魯迅同意翻譯其「阿Q正傳」。一九三五年元月十八日魯迅函鄭振鐸盛贊斯諾，說「S君是明白的。有幾個外國人愛中國，遠勝於有些同胞自己，這真叫人傷心。」

斯諾在上海認識上海美國總領事館的書記海倫·福斯特（Helen Foster）小姐，兩人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東京結秦晉之盟，一九四九年因個性相異而分離。斯諾後與惠勒（Lois Wheeler）結婚。一九三三年春天斯諾偕

其夫人海倫自上海前往北平，除繼續撰寫通訊稿外並在北平私立燕京大學新聞系兼課，教「特寫寫作」，家住燕大校園約兩年。斯諾在平期間通過姚克與魯迅保持密切聯繫，其主要助手為中共黨員郭達。斯諾家中的常客除燕大同學外，有中共地下黨員北京大學的黃敬（俞啓威）和清華大學的姚依林等人，往來最多的還是燕大的王汝梅（黃華），斯諾後移居北平城內德甲廠十三號，也常是賓客不斷。斯諾此時並與人編輯英文「民主」半月刊。

一九三五年中共地下組織在北平發動「一二九」運動以前，斯諾拍發燕大學生自治會的反政府的通電等文件的通訊電到國外，其後又親自參與這一項運動。斯諾夫人還囑人送毛澤東一套「一二九」運動的照片，一九三六年斯諾由北平中共地下組織、宋慶齡、艾黎等人的秘密安排前往延安訪問，行前回到上海，於四月二十六日親到魯迅家拜晤未遇。當年六月初斯諾由設在上海江寧路武定路口的中共地下機關，上海大同幼稚園主人董健吾（筆名幽谷）秘密護送。董健吾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軍傳教，是馮的三位紅色牧師之一，後在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其妻黃惠光亦在園中工作。董對外用上海「基督教聖公會王牧師」身份工作，其護送斯諾遠行，就是這位王牧師。王牧師早去過延安一次，他於一九三六年二月曾秘密為宋慶齡送信給毛澤東、周恩來，並借張學良的飛機飛往延安註③。七月初斯諾到達陝北，七月九日在陝北安塞白家坪見到了周恩來，周為他安排了九十二天的訪問行程。七月十六日在

(二) 傳新迅魯

陝北保安會晤毛澤東，一連幾天作了多次長談，九月、十月又有多次晤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始返回北平，後有談話紀錄發表。魯迅死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斯諾夫婦曾為委員。

二次大戰時斯諾任英美報紙的駐華戰地記者，一九四一年被迫返美，一九四二年任駐印度美軍隨軍記者再到中國，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一年任「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 記者和編輯，一九五六年任哈佛大學研究員。斯諾經毛澤東的特別許可三度重返北京，一九六〇年六月、一九六五年元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均曾見到毛澤東作了相當長的談話。一九七一年三月斯諾離開中國客居瑞士，次年二月十五日病逝他鄉，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中共將其骨灰葬於北京燕園末名湖畔。

中共於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還發行一套「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分別紀念史沫特萊、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3-1970)及斯諾三人。早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中共在還北京成立「中國史沫特萊、斯特朗、斯諾研究會」，簡稱「中國三S研究會」，由黃華任會長。

魯迅最要好往來最多的美國朋友，應該算是伊羅生了。伊羅生一九一〇年九月十三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市一猶太地產商家庭，家居紐約市西七十七街六號。一九三〇年二月畢業於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獲學士學位，在校時主編校刊「旁觀者」(The Spectator)，一度任「紐約時報」記

者負責採訪紐約市布魯克林(Brooklyn)區新聞。畢業後去夏威夷任「火奴魯魯廣告報」(Honolulu Advertiser) 記者，並在夏威夷大學進修。他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奉第三國際命令前往上海工作，最初在美商「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任記者，次年元月轉任國人在上海接辦原美商「大陸報」(China Press) 編輯，並兼在上海法國哈瓦斯社工作。因編輯方針與南京意見相左，伊羅生與報館主持人董顯光不睦，任職僅四個月遂辭職。

伊羅生於一九三一年籌辦英文「中國論壇」(China Forum)，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註冊後於一九三二年元月十三日在上海創刊，竭力選登魯迅著作，全力宣傳中共及其領導的左翼活動，其間一度停刊，後改為中英文合刊，一九三四年元月十三日停刊。一九三二年七月政府曾向美國當局抗議，指斥伊羅生利用上海公共租界特權攻訐政府，表示擬予拘捕法辦，七月三十日「紐約時報」對此曾有詳細報導，其父聞訊後甚表關切，婉托美國國會眾議員拉瓜第(Florello H. La Guardia) 向美國務院交涉此案，並另電其子速返美國註③。因治外法權管轄權的關係，伊羅生並未改變其原辦刊物的態度，也未遽父命回國。

伊羅生在中國期間，多與第三國籍在華工作人員及國際左翼人士往來，與宋慶齡、史沫特萊、胡志明(阮愛國)等人均在這個時候相識於上海，並協同工作。一九三二年元月三十日，伊羅

生通過史沫特萊的關係認識魯迅，自此以後兩人關係非常密切，相互會晤、餐聚，函件往來魯迅有記錄的就有二十四次之多，兩人併肩為中共宣傳。兩人間的信函及魯迅著作翻譯，由魯迅指定楊小姐擔任註④。伊羅生與茅盾甚為友善，他的伊羅生中文名字，就是魯迅和茅盾代取的。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伊羅生在上海與姚白森(V. I. Robinsen) 小姐結婚，其妻一度在上海私立滬江大學夜校教書。伊羅生一九八〇年十月曾應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的邀請重訪中國，還特別到魯迅墓前致祭，回美國後還寫了專書紀念此行並回憶當年的活動經過甚詳。

伊羅生在上海「大陸報」工作時，與南非托派李福仁(Frank Glasser or V. T. Robertson) 相識。李福仁那時不過三十多歲，第一次大戰時曾在歐洲參戰，回國後立即加入南非共產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為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兩派，李加入托派活動，一九二八年遂被南非共黨開除，乃前往上海活動，一度在上海蘇俄塔斯社工作，並任密勒氏評論報編輯註⑤。一九三一年春伊羅生與李福仁沿江長江暢遊遠至四川旅行。李福仁遊至重慶後折返上海，伊羅生繼續前往直達藏邊康定，同年九月始返回南京、上海。兩人因政見相左，以後遂斷絕往來。

陳獨秀等人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伊羅生拒絕中共之囑在他所辦刊物上批判陳獨秀，伊羅生、李福仁立即被中共指為反革命、帝國主義、美國(或日本)間諜，一夜之間便由同志變成敵人。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蔣光鼐、蔡廷鍇在福建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簡稱「福建人民政府」）時，伊羅生前往福州觀察後回上海，遂參與中國托派活動。

一九三四年三月底，伊羅生夫婦移居北平，行前魯迅於三月二十五日招上海福建路大馬路口的杭州菜館「知味觀」在家治饌送行，賓客十人。伊羅生到平後任「倫敦每日快訊報」(London Daily Express) 駐華記者，在北平時得到中共一大代表後為托派的劉仁靜的協助，開始撰寫「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一書。

伊羅生還為劉仁靜寫了一本「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小冊子，一九三五年夏天回到上海，中國托派陳仲山、趙濟看到密勒氏評論報刊登伊羅生的新書廣告，便到報社拜訪他暢談甚久。六月二十五日伊羅生到魯迅家話別，七月返美，八月經挪威奧斯陸，見到了托洛茨基，還帶了劉的小冊子給他，並向他報告中國托派的活動情形。註⑦

伊羅生的中文譯名很多，哈羅德·艾薩克斯，伊薩克斯，易洛生，伊賓克，伊賽克等便是。一九四三年抗戰末期伊羅生以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 駐華記者身份來到戰時首都重慶，則用伊賽克譯名從事活動，中共的新聞報導只稱他為伊賽克，而不提他原是上海那位伊羅生。一九四四年伊羅生回國休假，次年政府阻止他重返中國。伊回國後先在麻州理工大學國際研究所從事研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升任同校政

治學教授，著作甚多，一九八六年七月九日病逝麻州波士頓。

魯迅最後十年因居上海，與中共、托派第三國際駐華人員及國際左派人士往來特多，他生前在文字上反對托派，在他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答托洛斯基的信說：「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但他老夫子的托派朋友就特別多。(完未待續)

註解

- 註① 陳頌聲：魯迅和創造社，中山大學學報，三期，一九八一，一百一十一頁。
- 註② 陽翰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經過，文學評論，二期，一九八〇、三、十五、十五頁。
- 註③ 同②，一六頁。
- 註④ 同②，一六頁。
- 註⑤ 夏衍：「左聯」成立前後，文學評論，二期，一九八〇、三、十五，四至五頁。
- 註⑥ 丁景唐：關於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的盟員名單，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五輯，一九八〇、四，四三至四四頁。
- 註⑦ 倪墨炎：郁達夫是主動脫離左聯的，人民日報，一九八五、一〇、二四，八頁。
- 註⑧ 紀文：「左聯」在上海的幾個舊址，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五輯，一九八〇、四，九八至一〇一頁。
- 註⑨ 陽翰笙：宣俠父與左聯，人物，三期，一九八二、五，四二—四九頁。
- 註⑩ 張大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況，新文學史料，一期，一九八〇、二、二十二，一〇五、一百十頁。
- 註⑪ 倪墨炎：魯迅革命活動考述，一九八四，一六二—一六六頁。
- 註⑫ 馮雪峰：回憶魯迅，一九五七，二四至三十一頁。
- 註⑬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四，新文學史料，一期，一九八五、二、二二，四五、四六頁。
- 註⑭ 徐懋庸回憶錄，一九八二，一〇三、一〇四頁。
- 註⑮ 蕭三：我為左聯在國外作了些什麼？新文學史料，一期，一九八〇、二、二十二，三十六—三十七頁。
- 註⑯ 蕭三給左聯的信，新文學史料，一期，一九八〇、二，二十二，一四四—一四六頁。
- 註⑰ 唐毀：回憶魯迅及三十年代文藝界兩條路線鬭爭，魯迅研究資料，一集，一九七九，六十三頁。
- 註⑱ 茅盾：「左聯」的解散和兩個口號的論爭，新文學史料，二期，一九八三、五、二二，二頁。
- 註⑲ 陳瓊芝：在兩位未謀一面的歷史偉人之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三輯，一九八〇、一〇，二〇五頁。
- 註⑳ 同⑱，三七頁。
- 註㉑ 同⑱，一五七、一五八頁。

註 22 甲、倪墨炎：魯迅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魯迅研究，三集，一九八一、六，三一〇至三二八頁。

乙、同 22 甲，三二一、三二二頁。

丙、同 21，一五三、一五四頁。

丁、許廣平憶魯迅，一九七九，二四一頁。

註 23 倪墨炎：魯迅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新文學史料，三期，一九八一、八、二二，四六頁。

註 24 同 21，一七九—一八一頁。

註 25 甲、黃源：宋慶齡與魯迅，人民日報，一九八二、五、二九，四版。

乙、廖承志：我的回憶之二，人民日報，一九八二、五、二九，四版。

註 26 鄭育之：掩護召開世界反帝大同盟遠東會議的經過，魯迅研究資料，五集，一九八〇、五，一九三至二〇〇頁。

註 27 包子衍、王錫榮：魯迅和斯諾間友誼的橋樑，魯迅研究文叢，二輯，一九八〇，二四三頁。

註 28 同 21，一一一—一四一頁。

註 29 Hearings on the Richard Sorge Spy Ca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51, P. 1228.

註 30 甲、同 29，一一七、一二三—一二一五頁。  
乙、周谷：五十年前發生在上海的「怪西

人事件」，中央日報，一九八五、一、十四、十五、十六，二版。

丙、Joyce Milton: A Friend of China, Hastings' House. Publishers, 1980, p. 17, 24, 26, 28, 54, 60, 71.

註 31 甲、路易·艾黎：魯迅的回憶片斷，人民日報，一九八一、九、二四，八版。

乙、梅達：老戰士的光輝歷程，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四、二一，四版。

丙、畢平非：「工合」——時代的產物，紅旗，一六期，一九八四、八、一四，二七頁。

註 32 甲、任武雄、余衛平：毛岸英、毛岸青同志幼年在上海的一些情況，文史資料選輯，二輯，一九八〇、五，五頁。

乙、簡又文：西北從軍記，一九八二，二〇〇頁。

註 33 American Warned of Trial by China, New York Times, July 30, 1932, p. 16.

註 34 Harold R. Isaacs: Re-encounters in China, M. E. Sharpe, Inc., 1985, p. 39.

註 35 甲、同 34，二八一—三二二頁。

乙、郭雄、高榮光：中國托派歷史情況簡介，黨史研究資料，一集，一九八二，四二五頁。

註 36 甲、王凡西：雙山回憶錄，一九七七，一九〇—一九四、二〇六頁。

乙、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黨史資料叢刊，二輯，一九八一、八，九〇、九一頁。

註 37 唐寶林：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歷史研究，六期，一九八一、一二、一五，一四一頁。

# 聖文姑妄言之 何敏著 牛哥圖

要目有：一場糊塗、啼笑皆非、不打自招、可怕的惡人、疲勞轟炸、不要臉、怕戴綠帽子、鬍子至上、多拉警報、拍馬屁、荷爾蒙、老少配、罵法種種、白虎現身、等的哲學、當心表錯情等七十餘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每本新台幣柒拾元整，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